

评关于“先锋艺术”的争论

何 国 瑞

作者 何国瑞,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先锋艺术 否定 和平演变 危险

提要 李琦联系西方对我和平演变来分析我国“政治波普”与“先锋艺术”的负面影响, 是对的。朱维民却认为这是“胡牵乱扯, 抡起千钧棒乱打一通”; 是“喊‘狼来了’消遣”。本文分析: 论争焦点的“椅子画”是别有用意的。苏联解体说明不仅“狼来了”, “吃人了”, 而且还想再“吃人”。邓小平指出: 西方国家“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要顶住这股逆流”。

近读《美术家通讯》1997年第10期转刊朱维民同志《擦亮眼睛之后——与〈擦亮眼睛〉作者商榷》的文章, 有些想法。朱文原载《方法》杂志1997年第7、8期合刊, 《江苏画刊》同年第12期也转载了。三次刊出, 可见很受这些编辑的重视, 便决心亮出想法, 求正大家。

1. 虽然《之后》的作者一开头就强调他是纯出偶然才写下这篇文章的, 但实际却是必然的表现。李琦同志在《擦亮眼睛》一文中说, 他曾因批评“政治波普”之类, 多次接到辱骂匿名信。朱维民同志的《之后》把匿名辈的思想和情绪公开化了, 是忍不住之后的爆发。这是好事。与其任其冒烟, 薰得人泪眼模糊, 不如让它烧起火焰, 照亮大家看是非。

朱、李的争论, 实际上是1990—1991年在《文艺报》和《美术》上开展的如何看待“新潮美术”的论争的再起和升级。我曾参加那次讨论, 并曾建议充分展开, 继续下去。后来不知何故, 中途停止了。在对待“新潮美术”上, 国内确实是存在着深刻的原则性的分歧的。“新潮美术”中的作品并不都是坏的, 有好的和比较好的, 但作为一种思潮和某些流派,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不起好作用的。李文批评“政治波普”之类是“给本国政权添乱”^①, 而朱文却认为李的批评是给当前社会“添乱”, 有碍于“加强全社会的凝聚力”。两人的观点如此尖锐对立, 怎么办呢? 只有采取论辩的方法, 让双方打擂台, 进行说理斗争。通过论争, 发展真理, 克服谬误。

2. 《之后》的作者一再说, 他“不是波普艺术的鼓吹者”, 对先锋派艺术“缺乏激情”。但奇怪的是, 他却认为这类艺术“是时代的变化使然, 也是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使然”。说这就

像流行歌曲和迪斯科舞一样，开始很多人不习惯，后来慢慢一些离休干部也爱上了。言外之意：这类先锋派艺术是历史的进步，谁也阻挡不了，应该让它慢慢去征服群众。所以，李琦“不识时务”竟敢批评，就被他“商榷”成了“捕风捉影”、“胡乱牵扯”，丧失了“一个评论家应有的职业道德”，最后被反扣上“给社会添乱”的帽子。并且，令人疑有暗唆“椅子”画作者跟李琦打官司之嫌，如说什么“今天已不是60年代，再没有人能靠制造冤案发迹了，人们有了自我保护意识，有了法律武器作后盾”云云。请问这是“缺乏激情”么？

关于“新潮艺术”是否我国改革时期的必然和必需，我在1992年曾作专文《评新潮美术“不可避免”说》^②，这就置而不论了。只依朱的论辩逻辑，略作反驳：如凡是由看不惯而后慢慢被很多人接受了的就是好的，就不能批评，那么赌博、吸毒、卖淫嫖娼、贪污受贿……这一二十年来不也是慢慢形成全国性的歪风毒风么？被裹进去的不仅有不少老干部，而且还有不少青少年哩！能说批评、反对、查处这股歪风、毒风，反而是给社会添乱么？

3.《之后》作者指责李琦没有看懂“椅子”画就“乱批乱打”。那请问：那两幅椅子画究竟是什么意思？朱说：“其实椅子就是椅子”。万没想到朱竟是如此为这画辩护的。“作诗必作诗，定知非诗人。”这种辩护词，画者本人恐也未必同意。否则，他何必花精力财力画出椅子之后，还要在椅子上面再画上三顶皇冠和一团黑糊糊的东西？还要苦费心机想出《同做一个梦》《椅子上的江山》那样的标题呢？这不正是画者的“美学诱导”——政治暗示么？朱文认为由此联想到党、国家、军委主席就是捕风捉影，而似乎应联想到“会议主席、工会主席、董事长或美协主席”才对。请问，工会主席等，与“皇冠”、“江山”联系得起来么？若画者只是要告诉人椅子就是椅子，那他为什么不像西方现代派达达主义者M·杜尚（1887-1968）把小便池直接摆到展览会上去那样，也把椅子现成搬出去就完事呢？要说明的是，杜尚1917年这样做的时候，给小便池取了个《喷泉》的标题，当它被拒绝展出时，多半是他匿名为自己辩护说：“他选择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将它摆放出来，这样在新的标题和新的观点下它的使用意义消失了——为物品创造了一种新的思想。”^③可见，这里小便池也不是“小便池”了。我相信朱维民对这一史实该是知道的。可他却为什么硬说“椅子就是椅子”呢？椅上画画面上的形象和着意的标题，已是给予了一种“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朱完全不顾实际，竟把李琦“商榷”成那个样子，这能服人么？是“与人为善”么？要真的“椅子就是椅子”，那肯定就不会有朱文和对它的一再转载了。

4. 作者对李琦《擦亮眼睛》的标题特别反感，问罪居然先是由此开始，由此认为李琦对青年人不怀善意，制造冤枉。公正的读者仔细看看李文就会发现，与其说李文是针对作这些画的少数青年的，还不如说主要是针对某些领导和一些总爱充当这少数年轻人的保护神（实则是促其更犯错误）的“长辈”的。对那些“昏昏然”的领导，李文已摆出了确凿的事实。领导的责任本是要使人“昭昭”的，可现在有些领导或主管者所做的有些事，却反而使“昭昭者”“昏昏然”或“愤愤然”。谓予不信，我再补充一个例子吧：“1988年11月底国家教委在天津召开了全国高校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我在大会发言中直接指名批评了刘再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背离和对唯心主义的鼓吹。可是紧接着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性的同一主题的大会上，刘再复的论文却得了大奖。他的论文是什么呢？正是以‘文体革命’相号召，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这种奖励多么荒唐、多么糊涂！其导向作用又是多么恶劣、多么迅猛！紧随其后，马上有李陀等《“语

言”的反叛》相呼应,说“语言的解放”首先就是要冲破“毛文体”的控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思想。但愿今后所有领导都能清醒起来。”^④至于充当保护神的例子,不仅美术界现存,就是文学界、学术界也不乏其人。1983年,邓小平曾严厉批评:从地方到中央有些演员走穴捞钱,“到处乱跑乱演”,不顾起码的职业道德,“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⑤后来有的主管部门对个别太不像话者采取了一点轻微的措施,于是,报刊上就有一些“长者”站出来了,说什么:他们毕竟年轻,要允许犯点小错;现在实行市场经济,这是难免的;在西方国家,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这样做不利人才成长,等等,等等。结果现在终于发展到:演员拍片,演到一半停下来,要提价;歌星本已签好合同,临出场了,要提价,钱到手了,还硬要亲手一张一张验收无误才上台,开口唱那所谓“爱的奉献”;有的歌星更成了吸毒者。诸如此类,真可谓与西方“接轨”了,甚至比西方还要“西方”。更有甚者,把艺术当作反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李琦痛感于此,出于对艺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呼吁上下有关人士“擦亮眼睛”一起遏止、纠正这股歪风,有何过错?

邓小平1981年就指出,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⑥。1983年,他又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首先要认识目前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改变思想战线领导软弱涣散状态的迫切必要性。”他在指出当时对精神污染和思想混乱仍不敢批评和批评困难的情况时,说:“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当时他坚决要求“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⑦。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彻底扭转了没有呢?是不是还有过之呢?

邓小平在1983年的同一讲话中还说:“‘文化大革命’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⑧什么是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呢?邓小平有准确的说明,即“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⑨李琦的《擦》文和朱还提到的李琦的《千万不要忘记》等文,是“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批判”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么?朱文怎么就将它与“文革”中的冤案、乃至与清代的“维民所止”案联系起来,并那么断然地认定李文是“抡起千钧棒乱打一通”呢?公正者不是反而从朱文中看出了“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影子么?

5. 最后说说关于“狼来了”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文学刊物也看到过不止一次了。谁要联系起国内外种种敌对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和危害的背景,批评文艺界某些负面现象,说可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时,有人就说是又喊“狼来了”,还想搞“文革”那一套!他们的潜台词是:并没有咬吃社会主义的“狼”,不过是虚构出“狼”来吓唬人、箝制人罢了。如果说当年毛泽东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还是一种预测,怀疑者、否定者还可指说是“喊狼来了”的话,那么,当1991年苏联瓦解、东欧变色已成为震惊世界的事实时,谁还要把严肃忧患的忠告指责为“喊狼来了”,那就真不知他们究竟是政治幼儿、政治盲人呢,还是因为他们有着别样的心理(现在流行用“心理”,而忌讳用“立场”,故也从俗)?有俗话说,隔壁死人隔壁哭。我们能不能问问:你们是社会主义的“隔壁人”么?

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者、进步人士和广大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农兵,对苏联的灭

亡，是痛彻心肺的。认真思考，总结苏联灭亡的原因，并切实吸取经验教训，是刻不容缓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苏联是怎么灭亡的呢？原因复杂多样。主要是什么？

有人说主要是经济没搞上去。事实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它的发展中是有问题，一是农轻重的比例在战后仍失衡，二是计划统得太死，三是利用高科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行动迟缓。但是，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1913年，按后来苏联的地域算，沙俄的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美国同年的6.9%，到1985年则变成80%，有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总体经济实力从世界第五、欧洲第四跨进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了。这一点连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承认的。牛津大学教授杰·巴勒克拉夫1978年主编出版了一部世界历史的书，说苏联到70年代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在诸如铁矿石、煤和水泥等基本产品上超过了美国，石油和钢的生产接近美国。”^⑥

苏联灭亡的内因，主要在于党的领导。斯大林曾犯了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在肃反中搞了扩大化，在文化思想领域曾搞简单化，如在文学艺术上，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做出错误的决议，把某些有问题有缺点的作家艺术家，开除国籍，驱逐出境。这就形成了人民的积怨，给了内外敌人以口实。赫鲁晓夫则在思想上堕入修正主义泥坑，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在文学艺术上推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否定斯大林，借此丑化、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更是完全在思想意识上与西方资产阶级站到了一起，推行什么“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设进行根本改革”，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掘墓人。过去被驱逐的作家艺术家都被当作宝贝请了回来，被批判的作品甚至包括十月革命前后逃亡的作家的作品，不作具体分析，一概成了抢手货，争相出版。对西方敞开国门，成为配合西方和平演变苏联的罪魁祸首。难怪苏联解体时，当时西方政要曾狂欢大叫要给戈氏颁发勋章。前苏共中央总务部长瓦·博尔金在苏联灭亡后所著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无比痛心地说：“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有摧毁和支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⑦这是当年戈氏的追随者，在亡党亡国后所吐出的带血的真言！

为什么列宁所说的有着消化钢铁的胃的布尔什维克党，会这样蜕变呢？为什么几百万党员会管不住自己的首脑呢？这里有更重要的教训值得总结。我只提两点：一、掌权后，一部分党员做官当老爷，腐化堕落，一心升官发财，再不顾其他了；二、党的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没能坚决彻底实行，慢慢成了会议上的形式，最后成了党章上的文字。这样，就失去层层监督领导直至领袖的最有效的方法，使党失去了防腐剂。

苏联灭亡的外因，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各国同心协力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关于西方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我曾有《学会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持久战》专文论述^⑧。李文也引用英国电视片作了揭示。这里再简略补充一点材料。苏联灭亡后，美国政府的一些谋士和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纷纷撰文、著书，公开他们搞垮苏联的秘密，以夸胜利。彼得·施泽尔在《胜利：美国行政当局的秘密战略在苏联和社会主义解体中所起的作用》一书中说：“苏联倒台……不是由于天赐我们良机……苏联改革是里根所奉行的政策的结果”；“战略明确表述：我们当前的目标已经不是与苏联共存，而是要改变苏联的制度。”做过美驻苏大使（1986

年—1991年10月)的马特洛克以目击者、实际也是参与者的身份写下的《苏联解体亲历记》^⑥,就更使人大开眼界了。不知朱维民等和一些“昏昏然”的领导读了没有?他总结说: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美国政府靠的“支持鼓励苏联的民主化、人权和信息流动的政策”。这位大使特别强调了文学、新闻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起的作用,说“新闻媒体发起了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在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阶级斗争理论被官方人士放弃了”;苏联领导人“抛弃了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无关紧要了”;戈尔巴乔夫“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其内容已不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而是接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这是我们大家都认可的社会”。请看看,这是狼吃了一顿美餐舔干嘴唇上的血迹之后,所唱的多么安逸的胜利曲!

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千多年前的这位先人说的这两句话,份量有千钧重,值得我们全体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深长思之!

事实上,美、英等对我国的和平演变早从50年代就开始了。杜勒斯1950年就宣布美国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争”。60年代美国新闻署发出文件指示众多的下属机构和人员:“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请注意“灌输”两字!我们一些人对列宁讲的要“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观点却那么反感——作者注)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他们想的是何等深远!也是60年代,美国政府在给好莱坞影片公司的备忘录中,要求其电影进一步配合它的“全球战略”。1989年的北京动乱,美国下台总统尼克松说,没有他70年代打开中国的国门,就不会有1989年的上街。《华盛顿邮报》1989年5月2日刊文说:“美国应对中国的情况做些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它应当像对待苏联、匈牙利和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敦促它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它走向资本主义。”1989年动乱,“狼”已蹲在我们“国门”,伸舌张牙,朱维民等不知何故,竟视而不见。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呵!更莫忘“狼”还披上“外婆”的外衣啊!

“苏东欧”事变后,美国取得了大胜利,是否会放过我国呢?尼克松在《1989不战而胜》中说:“中国和苏联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它们两者的天然敌人。”克林顿一上台,他提名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993年1月13日在参议院外委会上等候对他的批准时说:本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仍是“设法鼓励那个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他们不仅是说说,而是说了就干。在搞垮苏联和东欧中,美国的“自由欧洲电台”是起了大作用的。《华盛顿邮报》说:“西方世界为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这些新闻使苏联和中国人开了眼界,于是他们就起来要求民主、自由,这就是两个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于是,克林顿政府积极筹办,于1996年9月30日开办了“自由亚洲电台”,从它开播的语言和时间看,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其台长理查德·里斯特说:它的开播“是长期广播战中的一条新战线。”(请注意“新战线”——作者)内容“着重于中国大陆的新闻报导,特别是有关西藏及对中国大陆被查禁或看不到的书刊及文学著作的介绍。”据了解,与之配套,美、英等西方国家已在我国上空发射了几十颗能传播他们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卫星。这里还必须提到一点,美、英等西方国家更利用电子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和将要对我

国进行更隐蔽、更有效的思想观点、情感趣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和渗透。一张新式光盘，能够系统地容纳西方意识形态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将大大超过一般文字广播电视；各种诋毁、颠覆的信息，全可以通过全球计算机网络轻易地进入各终端计算机中。对此，我国科技界已有权威学者发出“要防止电子信息侵略”的呼吁。这是极具远见和非常及时的。要不引起高度重视和及时采取有效防卫措施（目前的扫黄打非手段是远不够的），那将要吃大亏的。

国外如此使劲，国内是否风平浪静呢？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意识形态领域搞自由化思潮，或宣扬错误思想，实际上起着配合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邓小平1983年就指出，文艺方面，有些人热心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现代派”思潮，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主张描写社会主义的异化，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①。这种倾向一直没有得到遏止。李文中已指出了美术界的情况。文学界呢？解放军内有共产党员作家大写反共作品，还居然有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颁发给10万元巨奖。同样是共产党员作家写的色情小说，其生理刺激使人堕落的力度，远远超过了《金瓶梅》，也是一样是由党领导的出版社公开大量出版发行。在理论界，一些人或公开鼓吹“告别革命”，露骨地污蔑党领导的革命“黑暗、残暴”，“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或公开主张要利用卡拉OK、流行歌曲之类的大众文化，“来消解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夺取文化话语权”，等等，等等。是这样确凿无疑，毫无含糊、隐晦。

我在上面列举了国内外的这些事实，朱维民等是不是也会认为是“空喊狼来了以消遣”呢？

邓小平一再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②“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③又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④这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提醒。江泽民同志号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反和平演变也是赫然写上了这面旗帜的。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和平演变。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注 释：

- ① 李文原载《美术》1997年第2期，“添乱”之说笼统了一点：既可理解为造成了乱子，也可理解为增加了思想上的混乱，给添了麻烦。李文该是后一意思。
- ② 见《文艺报》1992.3.21，又见《美术》1992年7月号。
- ③ 休·昂纳等：《世界美术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89页。
- ④ 何国瑞：《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
- ⑤⑥⑦⑧⑨⑩ 《邓小平论文艺》，第83、15、86、114、87、83页。
- ⑪ 《世界史便览·公元前9000年—公元1975年的世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42页。
- ⑫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 ⑬ 见《人民日报》1990年12月5日，又见何国瑞主编《文坛是非辩》，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⑭ 该书1996年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了中译本。
- ⑮⑯⑰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380、311页。